

追迹

考古学人访谈录

II

王巍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追迹

考古学人访谈录

II

王巍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 / 王巍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25-7879-5

I. ①追… II. ①王… III. ①考古学家—访问记—中国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5553 号

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

王 巍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4,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879-5

K · 2128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言

2013年夏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仁来找我,谈起他们出版社想出一套面向社会公众、介绍考古学者的丛书,希望得到我们研究所的支持。我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全力支持。

我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应允,是因为我多年以来痛感民众对了解考古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我们学界拿出来的可面向社会公众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介绍考古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著述却比较匮乏,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即便有一些介绍考古学的著述,也多以介绍考古发现为主,对主持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考古人的介绍却极为稀少。因此,社会公众和考古人之间有一个无形“鸿沟”。考古学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学术经历、治学心得、心路历程等等,这些十分生动、鲜活的“考古史”却鲜为人知。《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考古网是我所主办的学科门户网站,多年来致力于宣传考古学研究成果,同时积极探索公共考古活动的推广,其举措之一即是精心组织了对考古学者们的专访。《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收录了中国考古网对老、中、青三代考古学家的访谈,使读者可以了解这些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考古学家们从事考古发掘和相关考古研究的经历和体会。《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中收入的考古学

家,绝大多数是多年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学者。他们发掘的对象的时代和内容各不相同,有史前时期的村落,有历史时期的都城,也有各个时期的墓葬,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他们对亲身经历和体会的讲述,可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还有的学者通过田野考古之外的其他方法和手段,如科技考古,进行考古研究,这部分是考古学不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所在,他们同样可以使读者领略考古学的博大精深,和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体会到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交叉学科。

虽然接受访谈的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追求真理,言必有据,绝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在社会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考古学家的这种务实精神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二是敬业和奉献精神。这些考古学家多数已经从事考古学研究三四十年的,甚至更长,他们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考古工作需要到各地去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一年中有大半年出差在外,照顾不了家庭,自己的父母妻儿患病时往往不能陪在身边。田野工作白天八小时在考古发掘现场,晚上回到驻地还要整理发掘记录、撰写发掘日记等,一忙就到了十一二点,因此,每天工作时间往往长达十几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工作做好。

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田野考古是室外作业,风吹、日晒、雨淋。一个发掘季节下来,白皙的皮肤会晒成“茄子皮”色,人也“显老”好几岁。春季刮大风,沙土满身满脸,成为“土人”。夏季骤雨突袭,躲

避不及,整个人顷刻成“落汤鸡”。酷暑季节,阳光暴晒,汗流浹背,不仅衣服被汗水湿透了,连眼镜片都可能被汗水浸湿。考古学家们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发掘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考古成果。业内人士往往只看到一个个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殊不知每个发现背后都有着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每个发现都是他们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这套书中收入的考古学家只是中国数以千计的考古学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人队伍的一个缩影。希望读者们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能够加深对中国考古学家的了解,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想、有志向的学者群体,他们可以说是最执着、最坚韧、最接地气的群体。他们为研究和复原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而孜孜以求。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珍贵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王 巍
2014 年冬于北京

目 录

王 巍 / 序言	i
冯 时 /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
郭大顺 / 通神礼玉,问祖寻根	21
李新伟 / 为伊消得人憔悴	59
水 涛 / 身体力行在考古的田野中	83
徐良高 / 情系两周,探本求源	107
徐苹芳 / 探微与纵览盈卷,实践并思考争辉	131
许 宏 / 探源中国,情系三代	151
严文明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75
袁 靖 / 文理结合,开拓创新	189
郑振香 / 司母辛,武父乙	211
朱乃诚 / 执着探索,不懈奋斗	233

冯
时



2013 年在洛杉矶 Getty 研究所

简介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市。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暨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职。

学术专长:研究领域为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旁治商周考古学、天文年代学、先秦史、古代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及科技史。出版学术著作11部,发表论文190余篇,主编《金文文献集成》。在天文考古学研究方面,所撰《中国天文考古学》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具有学科奠基性意义,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首倡中国文字起源两源论。

主要代表作有著作《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古文字与古史新论》,论文《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解读》、《〈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邑”考》、《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等。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冯时先生访谈录

采访者：赖彦融

赖彦融：冯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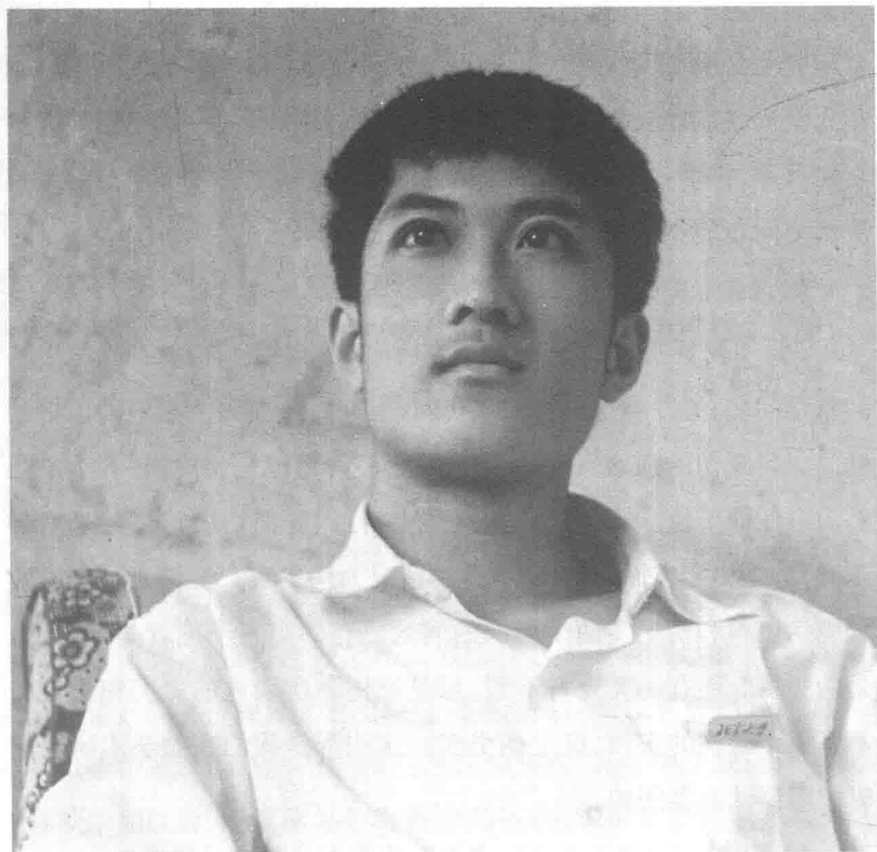
冯 时：你好。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

赖彦融：不同的学科都有可能利用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您能跟我们聊聊古文字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的研究特点吗？

冯 时：不同学科的研究，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运用古文字材料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对于书法艺术而言，一般只是从艺术的角度探讨文字的书风、字形的结体和破体变化。在狭义的中文系里，较多的则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去研究古汉字的字形、音韵、训诂和语法等问题。至于历史学的要求当然又不一样，首先它得把古文字当作史料来看待。古文字材料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解决古文字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学科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去解决历史问题。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最终也是要解决历史问题。可是它和传统的历史学又有不同。传统的历史学只需要利用文献材料就可以，并不

要求运用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更不需要研究者有田野考古的训练。所以说,考古学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不仅要关注古文字材料和文献史料,还要关注古代遗迹遗物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处理古文字材料,同时还得处理与出土文献相关的、能够彼此印证的遗迹和遗物。比如我们研究青铜器铭文,自然就会考虑器物本身的形制特点,会借用考古类型学作为辅助方法去解决器物的时代问题;研究甲骨文,在文字以外还得考虑甲骨的坑位、出土层位关系及钻凿特点。判别文字材料的时代或深入探讨文字内容,可能还要结合遗址的状况和器物的发展。我曾经看到这样的研究,学者将某个文字考释为某种器物的象形文,但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该种器物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单纯的古文字研究与在考古学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的区别,也说明古文字研究利用考古资料的必要。所以说在考古所研究古文字,不仅要把古文字作为史料来利用,同时更要关注和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如此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其实,无论身在哪个系所,也不论你是什么学术背景训练出身的,最关键的还是看你研究什么问题。只要你研究的是历史问题,利用古文字材料都最好能够掌握地层学、器物类型学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即便是研究语言、书法,也得把材料的时代梳理清楚。预先考虑的问题越多,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就越客观。

文字材料的出现往往会对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像甲骨文的发现对于殷墟性质的认定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同时,考古学的发展对古文字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化虽然需要通过学科自身的完善来实现,但脱离考古学的支持则无法想象。学科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在研究古史问题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思考,而考古学对于古文字学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大学时代

赖彦融：您通治古文字学的各个子学科，范围涉及传统小学诂训、年代学以至科技史和思想史等。如此广博的研究层面，个中系统能不能说就是去“攻坚”历史问题？

冯 时：对。古文字研究本身已经很狭窄了，如果只限于枝节问题而纠缠不清，自然会影响到治学的格局。尽管某些古文字的基础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学问既需要从小到大，也需要从大到小。胸中无全局，枝节问题也难解决。所以我想，从事古文字研究最好能把材料打通，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融会贯通，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

赖彦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吗？

冯 时：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历史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史料的真伪问题，另外就是史料的年代问题，同时还要关注相应的历史制度。史料真伪的判别当然有很多层次，一种情况是伪史料，其本身当然没有任何价值。还有一种情况是史料虽真，但它所记述的事情却未必真，是史实方面的伪，我称这类情况为伪史实。这涉及到史实鉴别中伪史料和伪史实两个层次的问题。有的史料干脆就是假的，这是伪史料。还有一类史料不假，可是记述者所表述的史实和史观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这是伪史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需要认真鉴别的。

赖彦融：关于“伪史实”，您能跟我们具体地多说说吗？

冯 时：“伪史实”是文本虽真，可里边讲的东西却未必真。史墙谀颂周穆王，虽然出于时人之笔，但他讲述的事情却不可尽信。近些年，学术界对五帝的讨论又成风气，或者仍以为太史公的《五帝本纪》就是信史。其实在春秋中期以前的出土文献中，我们根本找不到

五帝的影子,这说明至少商代和西周的人们并不知道五帝为何人。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其实对黄帝的史实交代得很清楚,当时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有关的学说,儒者或不传,《尚书》不载,说得非常客观。而至战国时期的铭文资料及竹简文字则开始出现黄帝甚至五帝的记载,但这些史料的时代过晚,它所记载的内容如果与更早的史料比较,显然不可能是夏以前的信史。战国文献反映的不过是战国的史观,这其中牵涉到史观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必须把它区分清楚。后人伪造历史,常附会世系,将氏之所出依附于某位圣王,这种情况在古史上极为常见,当然是受相应史观的影响。五帝的材料,春秋中期以前不见,这和周王室衰微、诸侯逐渐强大的时代背景正好吻合,可见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改变,相应的史观也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其实我们对古史的讨论,世系的问题非常关键。商王的世系我们了解得很清楚,甲骨文记商王的始祖就是夔,夔到底是谁?王国维说他是帝喾,很多学者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也不认同。因为契的材料很早就有了,而帝喾的观念则出现得太晚,所以夔应该是商代的始祖契。商人追溯自己的祖先也不过追溯到契,并没有出现过什么五帝。商人记录自己的世系当然不会有错。周人追溯夏人的祖先也只到夏禹。所以从商周两代的世系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并没有五帝的踪迹。五帝的史观应该形成于春秋中期以后,而且明显带有数术的色彩,它跟五方色联系起来,逐渐发展出五德终始的观念。所以对于史料的鉴别,伪史实的鉴别更为重要,古史辨派的学者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赖彦融:在鉴别出史料的真伪后,下一步应该就是要对史料进行断代吧?

冯 时:是的。研究某段时期的历史,就得利用那一段时期的

史料。假如用很晚的史料去研究早期的历史,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如研究上古音韵,一般利用的是《诗经》、《楚辞》的材料,但那些材料其实只能反映东周时候的语音状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商代、西周时的语音。我们研究商代历史,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叫它“直接史料”。而传世文献如《尚书》、《殷本纪》则是“基本史料”。基本史料虽然重要,但史料价值无法跟直接史料相比。对于史料的断代,在判断史观的发展方面尤其重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料,而一时代的史料必然体现着这一时代的史观,因而也就带有这一时代的局限。所以,辨清史料的时代对于伪史实的揭示将有着直接的作用。这一工作对于出土文献而言要相对容易一些。对这部分材料,断代要细。断代愈细,脉络就愈清晰。传世文献的形成则要复杂得多,即便如此,史料的断代工作也必须要做。总之,我们在利用史料之前,要首先把史料的时代分清楚。

赖彦融:近来您对山东莒县凌阳河大口尊陶文提出新说,认为属古彝文系统。其实,早于1994年,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一文已将邹平丁公陶文以古彝文释读出,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文字起源的二源说或多源说,马学良、俞伟超、松丸道雄等先生对此多有称誉。您对古彝文的研究机缘和研究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冯时:学术的发展最终都是由史料决定的,新史料决定了新史学。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完全是根据新史料获得的。当我们只见到甲骨文一种文字的时候,当然只觉得中国文字只有一种,没有别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汉文字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所谓刻画符号,我们的解读方法也只有一种,就是用甲骨文去做对读。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也好,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也好,江浙良渚文化出土的也好,时间和空间跨度虽然很



在紫禁城

大,可是我们都只用甲骨文去与它比较对读,并没有考虑到某些文字可能根本不属于汉字的系统,这是因为我们未能摆脱汉字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以为汉字才是先人使用的唯一标准文字。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我们认识到这种观点很有局限。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能够确定属于非汉字系统的古文字材料,使得我们的某些观念发生了改变。譬如,中国的古文字并不仅仅是汉字,它应该既包括汉字,同时也涵盖非汉字系统的古文字。这当然又牵涉到中国文字起源的讨论。这些变化实际缘起于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时代遗址所发现的陶文。陶片上的刻文不是单个文字,而是五行十一个字,已经具有了书面语的形式,所以它是文字应该没有问题。我用古彝文材料成功地把它解读出来,证明它不是汉字系统的文字。有了这些新的认识,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包括两个独立的系统:一个是东方的彝文字系统,另一个是西方的夏文字系统,东西方的划分则是以太行山为界的。

由此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对文字起源的讨论,不能脱离考古学的研究。因为某一种特定的文字,一定是被特定的族群使用的,而判断不同族群的唯一材料就是考古学文化。这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直接影响。所以,文字起源研究必须和与其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加以联系,这样才能在正确区别不同文字体系的基础上研释文字,因为文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意味着相同的象形符号可能根本不属于同一种文字体系。显然,文字的解读工作必须首先判别文字的不同体系,而文字系统的区分又不可能不以使用这些文字的考古学文化为背景。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借由考古学文化,判别出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东西两大文化群,这两大区划和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夷夏两种文字,也就是东方彝文字系统和西方夏文字系统